

中华近世通鉴·教育专卷

宋荐戈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华近世通鉴·教育专卷/宋荐戈著. - 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1999.12
ISBN 7-5043-3258-5

I. 中… II. 宋… III. 教育史-中国-近代-1838~1949
IV. G529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6958 号

中华近世通鉴·教育专卷

作 者:	宋荐戈
责任编辑:	杜乃建
装帧设计:	郭运娟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66093580 6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涿州市蘊铂印刷公司
开 本:	850×1168 毫米 1/32
字 数:	450 (千) 字
印 张:	18.125
版 次:	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5043-3258-5/K·79
定 价:	32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前 言

史者师也，非任意加工之工具也，故必以史为师，以史为鉴；既以史为鉴，则修史者必秉笔直书，力求客观、真实、全面再现历史，如史有不实，则无以为鉴。

中华历史，可资以为鉴者多矣，而最主要者，莫过于治乱得失，而治乱得失之根本原因，则在于政府与人民之关系。中华古来之政民关系，乃是压迫、奴役、剥夺、愚弄和反抗、斗争之关系，因此之故，中华历史上大规模之内战连年不断，乱多而治少，甚至于有乱而无治，所谓盛世也者，多为粉饰之词。黎民百姓于忍无可忍之时，则揭竿而起，将永远不能自我革命腐败已极之政府或王朝推翻。在此过程中，先有小打与“盗贼”之普遍兴起，继形成大打与“大盗”之横行，最后形成全国规模之总打，波浪滔天，将腐败王朝推翻。这种小打、大打、总打的战争，就是中华历史的主线。因此，中华历史，即一部战争史，亦即人吃人之惨史，历代王朝之军队，亦以对内镇压为其主要职能，而以对外御侮为次要职能。

至于近代历史，则中华人民所受宰割，尤其悲惨，国内之封建皇室与百官宰割之外，复加以西方和东方列强之宰割，更苦不堪言。因而中国近代之反压迫、反侵略之斗争，也最为激烈，其规模空前浩大。中国近代，更是风气初开，民心大变，改弦更张，除旧布新的年代，对此，读者读之，当有自己的感受和看法。

晚清至民国，其史书中均有赈灾之记载，此多为虚假之自我涂脂之举，实则赈灾之钱，多为层层贪官污吏所中饱，并未达灾民之手，万千灾民，多死于沟壑而无人问闻，而赈灾之记载，惟可以作贪官财源滚滚之记录。

本通鉴记事，上自 1838 年，下迄 1949 年，共一百一十二年。全书分四卷，其第一卷为主卷，由王俯民撰；第二卷为外交专卷，由樊书华等撰；第三卷为经济专卷，由果鸿孝撰；第四卷为教育专卷，由宋荐戈撰。

若能以百年史实之鉴，启人良知，砥砺其志，则著书诸同仁数年心血不虚掷矣。

因水平所限，错误之处，还请读者予以指正为幸。

主编

目 录

上篇 晚清教育·····	(1)
教育宗旨、教育规章、教育制度·····	(1)
教育机构、教育社团、教育报刊·····	(57)
学校教育、留学教育·····	(78)
下篇 民国教育·····	(134)
教育方针、教育政策、教育制度·····	(134)
教育机构、教育社团·····	(209)
高等教育、留学教育·····	(279)
中学教育、小学教育、幼稚教育·····	(349)
成人教育、干部教育、职业教育·····	(439)
师范教育·····	(507)

上篇 晚清教育

教育宗旨、教育规章、教育制度

1840 年（道光二十年）

本年，两广总督林则徐为了解各国情况，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，辑成《四洲志》一书。该书记载了 30 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，是当时我国比较系统的世界史地书籍，对于向国人进行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的教育有着启蒙的作用。

1841 年（道光二十一年）

本年，新任两广总督祁埏上请推广文武科试疏。指出“文场乡、会试第三场，试以对策；武场乡、会试内场，试以默写武经。主司果于是取人，士子果于是考究，本足以规实用。只以相沿日久，不免视为具文。”他建议“变通考选之制，如文试第三场策问五道，请定为五门发题：曰博通史鉴，曰精熟韬铃，曰制

器通算，曰洞知阴阳占候，曰熟谙舆图情形”等，提议将制器通算等实用知识列入科试。他说只有这样才“不致用非所学”。

1842 年（道光二十二年）

8 月，著名学者魏源（湖南邵阳人，与龚自珍、林则徐为挚友。不满晚清政治腐败状况，要求改革，反对外国资本义列强侵略，主张严禁鸦片。鸦片战争期间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，在浙江参加了抗英斗争。后考中进士）撰著《圣武记》。后经 3 次修改，于 1844 年定稿，共 14 卷。该书指出：“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，在综合名实始。欲综合名实，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、讨国故始。舍胥吏例案而图诤谏、图远猷始。”在这里，魏源把重“楷书帖括”看成弊政；提倡以研习朝章，讨论国事为主要内容的实学。也就是说，他主张改革科举制度，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。

12 月，魏源以林则徐组织专人辑译的《四洲志》等书为基础，开始撰著《海国图志》。该书于 1847 年完成，共 100 卷。这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。他在书中提出应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观点，主张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。认为只要中国人奋发图强，就能“尽得西洋之长技，为中国之长技”。

1843 年（道光二十三年）

8 月，道光皇帝在上谕中指出：“八旗根本，骑射为先，清语尤为本业”。要求八旗子弟应熟悉骑射及满语，方准参加文武试。

本年，两广总督祁埵上疏请开制器通算一科。

1844 年（道光二十四年）

12 月 28 日，道光皇帝批准两广总督耆英奏请，同意“中外

民人，凡学习天主教并不滋事为非者，概予免罪”的主张。

1845 年（道光二十五年）

本年，洪秀全、冯云山于 1843 年在广东花县创建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开始传播。杨秀清、肖朝贵、韦昌辉、石达开相继入会，并成为拜上帝会的主要成员。为了传教，洪秀全编写了《原道救世歌》、《原道醒世训》、《原道觉世训》和《天条书》等著作。指出今世道乖漓，人心浇薄，所爱所憎，一出于私。“天下为公”的理想在大同社会“尚可望哉”。他以“阎罗妖”为一切妖魔邪神的集中代表，并将阎罗妖与清朝皇帝联系起来，号召“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”。他借用宗教外衣宣传革命思想，并用这种思想教育群众。

1846 年（道光二十六年）

2 月 8 日，道光皇帝下诏，不许各地官吏再禁天主教。命令各地官吏将因教禁而没收的天主教堂，“除改为庙宇民居者外”，“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”。

1848 年（道光二十七年）

冬，洪秀全撰《太平天日》。该书记述洪秀全为了教育群众解除孔孟之道的思想束缚，假借在重病时升天受命，得知上帝“推勘妖魔作怪之由，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”。因此“天父皇上帝怒甚，命天使鞭挞他”。孔丘跪在天兄基督面前哀求不已。最后孔子被送到了天上的菜园里劳动。书中说：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，上帝差遣他下凡人间诛妖灭魔，拯救人世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用这种方法来鼓动群众造反起义是有很大作用的。从教育角度来说，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封建教育的灵魂，儒家著作是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。所以这部著作否定孔丘实质上

就是否定封建教育。

1850 年（道光三十年）

12 月，咸丰皇帝发出上谕，要求各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转告各地方官及各学教官，“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，均令以御纂《性理精义》、《圣谕广训》为课读讲习之要，使之家喻户晓，礼义廉耻油然而生，斯邪教不禁而自化，经正民兴，庶收实效”。

1851 年（咸丰元年）

本年，太平天国曾钊扬等编成《幼学诗》。这是一本作为训蒙用的五言韵语教科书，共 34 首。涉及君道、臣道、父道、母道、子道、夫道、妻道等诸多方面，均为人们的道德准则和生活条规。其中也包括了宗教、道德、政治、常识等方面的教育内容。次年，天王洪秀全旨准颁行全国。

本年，咸丰皇帝发出《复御史王茂荫奏请振兴人才谕》。谕曰：“近来文风日盛，留心经济者固不乏人，第恐沾染时习，以文章风雅自诩，不思讲究本务，殊非崇实黜华之道。”要求宗室及八旗大小臣工“嗣后益当奋勉砥砺，求为有用之学，以备国家腹心干城之造”。

1852 年（咸丰二年）

本年，太平天国颁布《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》，指出“各有志者万殊之众，名儒学士不少，英雄豪杰亦多”。在这里，把“名儒学士”列入有志于革命的群众之中，表明太平天国是欢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。

1853 年（咸丰三年）

本年，太平天国定都天京（南京）后，颁布《天朝田亩制

度》。其中关于教育方面的规定有：（一）在儿童教育方面，规定儿童每日都要到礼拜堂，由两司马教读《旧遗诏圣书》、《新遗诏圣书》及《真天命诏旨书》。儿童在礼拜堂可接受识字、道德和宗教的启蒙教育。（二）在成人教育方面，规定礼拜日由各伍长率男妇至礼拜堂，分别男行女行，听讲道理，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。成人教育包括宗教教育、政治教育和生产教育等各个方面。两司马负责向群众宣讲《圣经》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，以至实行奖惩。此外，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，师帅、旅帅、卒长应更番至所统属之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，教化人，兼察其遵条令与违条令及勤惰。这说明太平天国地方各级领导都负有对群众进行教育的责任。（三）礼拜堂不仅是祭奠赞颂“上帝”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，而且是进行群众教育的场所。各级地方官不仅管理行政，而且兼作教师。（四）无论男女老幼都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，因而含有平等主义的民主因素。但是事实上，在当时生产落后的小农经济社会里，这种乌托邦式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本年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下删改《诗韵》诏。诏曰：“咨尔史臣，万样更新，《诗韵》一部，足启文明。今特诏左史、右史，将朕发出《诗韵》一部，遵朕所改，将其中一切鬼话、妖怪话、妖语、邪语，一概删除净尽，只留真话、正话，抄得好好缴进，候朕批阅，刊刻颁行。”

本年，太平天国右史黄再兴编撰的《诏书盖玺颁行论》刊行。指出“当今真道书者三，无他，《旧遗诏圣书》、《新遗诏圣书》、《真天命诏旨书》也。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，皆不准买卖藏读也，否则问罪也。”于是，在太平天国管辖地区出现了“敢将孔孟横称妖，经史文章尽日烧”的反孔斗争热潮，对于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的冲击。

1854 年（咸丰四年）

2月，曾国藩发布《讨粤匪檄》。他在檄文中指责太平军“焚郴州之学宫，毁宣圣之木主，十哲两庑，狼藉满地。嗣是所过郡县，先毁庙宇……以至佛寺、道院、城隍、社坛，无庙不焚，无像不灭”。太平军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，一旦扫地荡尽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，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”。宣称他率部讨伐太平军是为了“慰孔孟人伦之隐痛”，“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”。

5月，咸丰皇帝谕内阁：八旗人员仍有专习汉文，对于清语、清文全不讲求等情。重申八旗无论何项出身人员，均宜练习清文，通晓讲解，以务根本。

本年，太平天国在天京（南京）开科取士。科举考试时废除了门第出身的限制，亦无种族、贵贱、贫富、男女之分。“无论何色人，上至宰相，下至听使，均准与考。”考试分文武两途。考试题目都出自旨准颁行诏书。考试程序分县试、省试（即乡试）、京试（即天试）三级。本年天试文科元甲3人，为吴容宽、汪祖愧、夏庆保，分别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均授指挥职；二甲取中者为翰林，授将军职；三甲取中者为进士，授总制职。武科以武元合为武状元，职同指挥；谷光辉、周德三为榜眼、探花，职同将军。另有武进士共200余人，皆职同总制。此外，本年安徽、湖北两省举行了乡试，取中者称举人。

本年，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下旨颁行《御制千字诏》。每句4字，共1104字。它以“维皇上帝，独一无二”开头，以“臣僚辑睦，千字诏终”为结尾。内容包括自然、社会、天文、历史、动物、植物和有关日常生活方面的知识。它既是对儿童进行识字教育的课本；也是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读物。

1856 年（咸丰六年）

7 月，清政府颁行满汉文合璧的《五经新语》，供八旗子弟诵读。8 月又命刊刻满汉文合璧的《孝经》。

1859 年（咸丰九年）

本年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在香港、上海学到的西方知识撰成《资政新篇》。洪秀全在审阅该书时，曾多处批上“此策是也”、“是”等语，批准作为官书颁布。《资政新篇》是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性的建国方略。共分四个部分，即：用人察失类、风风类、法法类及刑刑类。在法法类中提出了有关发展文化教育的政策和办法。洪仁玕在书中主张设立牧司、教导官负责教化工作，革除陋习和腐败的生活方式，以移风易俗。他在书中认为“火船、火车、钟鏢、电火表、寒暑表、风雨表、日晷表、千里镜、量天尺、连环枪、天球、地球等物皆有夺造化之巧，足以广闻见之精。”因此，对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，是应该学习的。他在书中还提倡设立“士民公会”办理教育。奖励人民开办学堂、医院，并由政府设立书信馆、新闻馆、邮亭等机构。本书的主张和理想是有进步意义的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结果未能付诸实现。

1860 年（咸丰十年）

11 月 19 日，容闳（广东香山，1847 年赴美留学，185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，是在美国大学中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）从上海赴天京（南京），会见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，提出改良政治的 7 点建议。其中包括：设立武备学校，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；建立海军学校；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、以耶稣圣经为主课；设立各种实业学校。他的建议充满着资本主义

的气息，建议的核心是办好教育。洪仁玕对他的建议十分赞成。但是由于太平天国正忙于战事，而且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现资本主义教育的客观条件，因此容闳的建议不能实现。不久，容闳返回上海。

1861年（咸丰十一年）

9月20日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编撰《军次实录》一书，经天王洪秀全钦定刊行。书中有《谕天下读书士子》、《论道德才智》、《戒浮文巧言谕》等文。指出封建文学多是一些“吟花咏柳之句”、“八股六韵之词”。这些“浮文”“巧语”无补于“道德才智。”宣谕合朝上下官员书士“照得文以纪实，浮文在所必删；言贵从心，巧语由来当禁”。强调今后文学、朝谕、奏启、告示等项，必须简明易懂，“使人一目了然”。

12月24日，清政府命各省将军、督抚责成官绅在学宫、书院认真宣讲“钦定”《黜异端以崇正学四言韵文》，并由各学生员分赴城市乡镇进行宣讲，使该书内容家喻户晓，俾共知名教之可乐，一切诞妄不经之说无从煽诱，以正人心而闭邪说。

本年，太平天国颁布《钦定士阶条例》，对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方针和办法作了详细规定。首先规定，太平天国开科取士的宗旨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，也就是要“得非常之贤才”。其次，将原来的县、省、京3级考试制，改为乡、县、郡、省、京试（即天试）5级考试制。第三，把旧科举制度的秀才、举人、进士等名称一律改为“士”字，作为士阶。如改秀才为秀士，举人为约士，进士为达士、国士。武科的名称则相应改为英士、猛士、壮士、威士。还规定由地方官直接领导和监督取士工作。从而对隋唐以来相沿已久的科举制度作了一次改革。

本年，太平天国刊印《钦定英杰归真》，对于太平天国科举改革和招贤纳士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。

1862 年（同治元年）

本年，贡生黎庶昌上《应诏陈言疏》，批评科举制度“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之中，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，不为效命宣劳之用，徒困于八股、小楷、试帖无足用之物”。他建议罢去一切八股、小楷、试帖之弊，兼举德行、才能、文学与夫孝弟、力田、茂才、异等之属，以复前代取士之良法。

本年，同治皇帝谕称：“皇考御极之初，即命生童就试者兼习性理等书，原冀其趋向一端，则学术自正，以收化民成俗之效。乃近来各省教职等官，并不实力奉行，认真训课。”他要求“嗣后各省学政务当整躬率属，督饬各教官读书立品，勿为士子所轻。平时训导诸生总以躬行实践为归，勿崇尚浮华，勿虚应故事。”并要求“各教官分日于该处城乡市镇设立公所，宣讲圣谕，务使愚顽感化，经正民兴，正学昌明，人才蔚起。”

1863 年（同治二年）

1月31日，同治皇帝谕称，近来“专以文艺课士”，而“士子亦复以是为工拙”，这对于造就人才是没有好处的。因此，他要求“嗣后于应课时文外，兼课策论，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，用规实学”，“奖励精勤，惩戒游惰，黜华崇实，以端趋向。”

本年，候选知县桂文灿上《筹远虑重海防》条陈。他在条陈中指出，科举考试中“陋习相沿，前半则填写策冒，后半则全抄策题，行行必须到脚，卷卷如出一手”。这种作法“陈陈相因而不改者，则专尚楷学，积弊太深之故。”他还进一步指出：“夫楷学精工，何关乎政事文学？何补于国计民生？即妙等钟王，亦属小技。然欲其精工，非日日临摹，寒暑无间，多历年所，不能悦阅者之目。即日日临摹楷字，人之精神有限，光阴亦有限，致力于此，即不能不荒废于彼，既耗精疲神于楷字，岂尚能多读经

史，讲求时务，勉为贤良以期济世？”他说：这是很可惜的。因此，建议今后考试应“不尚楷字”，这样，士子儒臣均得以从容暇讨论经史，讲求掌故，或分习礼乐、兵刑、财赋、水利、天文、舆地之学。考试按其所习、分别命题，专精者固堪嘉尚，兼能者亦可并收，人材自有起色矣。

1867（同治六年）

3月5日，监察御史张盛藻鉴于同文馆拟设天文算学馆，招收正途人员入馆学习，并给予优厚待遇一事上奏折表示反对。奏折中说：“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，为其读孔孟之书，学尧舜之道，明体达用，规模宏远也。何必令其习为机巧，专明制造轮船、洋枪之理乎？若以自强而论，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、明政刑、严赏罚、求贤养民、练兵筹饷诸大端。臣民之强则惟物气节一端耳。”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，又藉升途、银两以诱之，“是重名利而轻气节，”而“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？”同日，同治皇帝谕称：“据张盛藻奏，科甲正途读书学道，何必令其习为机巧，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等语。朝廷设立同文馆，取用正途学习，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，不得目为机巧。正途人员用心较精，则学习自易，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……该御史请飭廷臣著议之处，勿庸议。”

3月20日，大学士倭仁上奏折反对科甲正途官员学习天文算学。他认为“天文算学为益甚微、西人教习正途，所损甚大。”并奏称：“立国之道、尚礼义不尚权谋；根本之图，在人心不在技艺。……天下之大，不患无才。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，博采旁求，必有精其术者，何必夷人，何必师事夷人？”4月6日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訢等上奏折驳斥倭仁。奏称：“仅以忠信为甲冑，礼义为干櫓等词，谓可折冲樽俎，足以制敌之命，臣等实未敢信。”4月12日，倭仁上奏折反对恭亲王等的奏折。

他说：“今阅总理衙门所奏，大率谓忠信礼义为空言，无当于制胜自强之实政，奴才愚见，窃谓不然。”他还指责说：令“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，其志行已可概见。无论所学必不能精，即使能精，又安望其存心正大，尽力报国乎？恐不为夷人用者鲜矣”。4月23日奕訢等上奏折指责倭仁制造浮言，阻止天文算学馆招生的顺利进行。他在奏折中说：“自倭仁倡议以来，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，设法阻拦，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”；致使总理衙门“无复有投考者”。

4月23日，同治皇帝为支持同文馆招收天文算学人才，命令倭仁著即“酌保数员，另行择地设馆，由倭仁督饬讲求，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，共收实效”。倭仁慑于上谕和朝野部分人士对设馆的要求，乃于4月25日奏称：“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，不敢妄保。”这样，才暂时平息了这场由于天文算学馆招生引起的事件。

1870年（同治九年）

本年，船政大臣沈葆楨会同闽浙总督英桂奏请特开算学一科，指出：“船炮之巧拙，以算学为根本”。应“诱掖而奖进之”。

1871年（同治十年）

9月，曾国藩、李鸿章拟订《选派幼童赴美肄业章程》，共12条。规定中国每年选送幼童30名至美国各校学习。其束脩膏火一切均由中国自备，并请俟学识明通，量才拨入军政、船政两院肄习。赴美幼童的年龄需在十三四岁至20岁为止。需曾经读中国书数年，其亲属情愿送往美国学习者。赴美幼童所习何业，所习何书，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记。幼童回国，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，听候派用。赴美幼童学习1年，如气性顽劣、或不服水土，将来难望成就者，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。这个章程由

曾、李二人奏报朝廷批准施行。

1874 年（同治十三年）

12月10日，直隶总督李鸿章上《筹议海防折》。他在奏折中力陈轮船、制器、铁路、电报、练兵诸事，在所必办。而科举文武两科考试，“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，隔膜太甚”。他提出科举考试的“科目即不能骤变，时文即不能遽废，而小楷试帖，太蹈虚饰，甚非作养人才之道。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，另开洋务进取一格，以资造就”。他还建议嗣后凡有海防省分，均宜设立洋学局，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。分为格致、测算、舆图、火轮、机器、兵法、炮法、化学、电气学数门，延请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师友，并将京师同文馆、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者，皆可调入洋学局为教习，并多方诱掖，奖惩兼施，就所学以课所事，尽力培养人才。这样，“二十年后制器、驶船自强之功效见矣”。

1875 年（光绪元年）

2月27日，《万国公报》发表《论西学设科》一文。该文作者表示赞成李鸿章别开洋务一科，“以试天文、算学、格致、翻译之学，与正科并重”。作者认为“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。”

3月，礼部上奏折反对在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，只是建议“现在山林隐逸，以及未秩下僚中，如果有专精算学者”，请飭京内外三品以上大员“核实保荐，听候简用”。“其本系正途出身兼通算学者”，可“别加优异，以示殊荣”。“若有资质明敏，愿学算法者，统归国子监算学照章学习。无论举贡生监及大员子弟，均准录取。”但是，这个建议也未实行。其后“各省学政考试，仍一体录送科场”。未开算学一科的考试。

4月3日，通政使于凌辰上奏折批评李鸿章奏请设立洋学局